

Against the Consensus:
Reflections on the Great Recession

從西潮到東風

我在世行四年
對世界重大經濟問題的
思考和見解

林毅夫◎著

余江◎譯

2008年的全球金融
美國金融監管放鬆是罪魁禍首，
不能怪罪於中國的匯率政策！



Against the Consensus:
Reflections on the Great Recession

從西潮到東風

我在世行四年對世界重大經濟問題的
思考和見解

林毅夫◎著

余江◎譯

中華書局

□ 責任編輯：黎耀強
□ 裝幀設計：高林

從西潮到東風

——我在世行四年對世界重大經濟問題 的思考和見解

□

著者

林毅夫

□

出版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499 號北角工業大廈一樓 B
電話：(852) 2137 2338 傳真：(852) 2713 8202
電子郵件：info@chungwabook.com.hk
網址：http://www.chungwabook.com.hk

□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9 字樓
電話：(852) 2150 2100 傳真：(852) 2407 3062
電子郵件：info@suplogistics.com.hk

□

印刷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香港觀塘榮業街 6 號海濱工業大廈 4 樓 A 室

□

版次

2013 年 3 月初版

© 2013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

規格

特 16 開 (230 mm × 170 mm)

□

ISBN：978-988-8236-14-5

本書中文繁體版由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授權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在香港、澳門地區獨家出版發行。

ALL RIGHTS RESERVED

巴曙松序

全球化的視角，新的分析框架

在閱讀林毅夫教授的新著《從西潮到東風》時，我想起 2007 年年末，林毅夫教授成為首位應邀主講劍橋大學「馬歇爾講座」的中國學者。馬歇爾曾經說：「事實上，近代經濟學的創始者差不多都是性情溫和、富有同情心和為人道的熱誠所感動的人。他們毫不例外地堅持這樣的信念：全體人民的福利應當是一切私人努力和公共政策的最終目的。」從林毅夫教授的《從西潮到東風》等一系列新作中，我們看到了馬歇爾所說的近代經濟學創始者的種種特質。我曾經在林毅夫教授主持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從事博士後研究，從多角度了解了林毅夫教授。林毅夫教授在即將到世界銀行擔任首席經濟學家之前，曾經到香港主辦一系列講座，闡述他對全球金融危機的思考以及對全球經濟發展的看法，我當時正好在香港工作，有幸聆聽講座，也為林毅夫教授獲得這樣一個施展才華、拓展視野的新平台而感到由衷的高興。在我主持翻譯的弗里德曼的《美國貨幣史》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之際，出版社聯繫當時正在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林毅夫教授，他很快就在百忙之中及時給予回覆並撰寫了封底推薦語。

2012 年 6 月，林毅夫教授結束在世界銀行的任期，回到北京大學繼續從事經濟學研究，我也關注到林毅夫教授回國後開始出版了一系列的新著作，其中包括這本《從西潮到東風》。在這些新著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擁有世界銀

行首席經濟學家職位經驗積累的林毅夫教授在研究成果中開始體現出鮮明的新特點，以我個人的總結，就是新的分析框架以及更廣闊的全球化視角。

2001 年，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彼時我們的國內生產總值規模總量僅佔全球的 7.4%，而到 2011 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規模已經接近全球 15%，這十年間中國迅速發展為全球工業生產中心，也幾乎擁有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這使得中國在這一輪危機中所遇到的挑戰和未來道路的探索都比以前更複雜，這既是對現有的經濟分析框架的挑戰，同時也給優秀的經濟學者以創新的動力。

在發展經濟學的演變歷程中，從早期強調進口替代戰略的所謂「發展經濟學 1.0 版本」，到對治理和商業環境改革的所謂「發展經濟學 2.0 版本」，再到通過隨機控制實驗改進服務供給的「發展經濟學 2.5 版本」，都在經濟發展史上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林毅夫教授從全球化的比較角度發現，過去發展中國家並沒有完全按照這種理論模式前進。在他看來，現在是時候立足於亞當·斯密的觀點，回歸到經濟增長的本質，關注比較優勢（資源稟賦）以及基於潛在比較優勢所能做好的產業。當前中國所面對的現實是，此前所依賴的人口優勢、環境資源優勢、低收入制度優勢等都已經逐步減弱甚至難以為繼，如何尋找新的比較優勢，通過制度和治理改革形成新的稟賦，可能是決定未來很長一段時間競爭優勢的核心，甚至也是新的全球一體化進程中尋求共贏之道的核心。

我想，這些問題也必然是以經濟發展理論作為主要研究領域的林毅夫教授在世界銀行工作期間經常思考的問題，《從西潮到東風》這本書可以說就是林毅夫教授將他在世界銀行工作期間的思考所得與讀者分享的一個階段性成果，讓我們得以從全球化的視角看待 2008 年以來金融危機的演化路程，也得以用更為協調、共贏的思維尋求解決之道。也許在不遠的將來，這一輪經濟危機逐漸平息，而新的國際經濟、貨幣體系雛形得以顯現時，我們還能清晰地記起林毅夫教授在此時展現給我們的探索和預測。

人們常說經濟學是經世濟用之學，經濟發展理論更是如此。作為首位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這一要職的發展中國家學者，林毅夫教授具有他個人鮮明的研究特點和優勢。林毅夫教授先後在台灣大學、北京大學、芝加哥大學、耶魯大學有過長時間的求學經歷，此後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等進行經濟學研究，並於 2008 年出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主管發展經濟學的資深副行長。這些長期在不同地區、不同機構、不同領域內從事研究和工作的經歷，使得林毅夫教授的研究不失理論深度又更關注經濟現實，專注前沿又注重反思。這在他從早年的《制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到新近的《新結構經濟學：一個反思發展理論和政策的框架》、《繁榮的求索：發展中經濟如何起飛》等專著中都已經有所展現。

在閱讀這些著作時，讀者可以發現，在林毅夫教授看來，這種反思的目的應當是尋求一條全球經濟共贏的改革道路。四年前林毅夫教授就職世界銀行時，正值金融危機發生之時，世界經濟受到嚴重衝擊，此前這輪「不尋常的投資拉動的長期繁榮」所掩蓋的經濟體系的固有缺陷似乎愈來愈難以找到對症之策，特別是各經濟體之間應對危機的經濟政策反而帶來更多摩擦和矛盾。事實上，即使在林毅夫教授任滿回國的現在，這場危機的後遺症仍然揮之不去，關於這場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的研究爭論和實踐摩擦還在繼續。

因此在這個時候，林毅夫教授的研究成果對我們認識當前全球經濟、中國經濟以及經濟學方法論方面都有寶貴的啟示和收穫。在本書中，我個人印象比較深的主要包括幾個方面。

首先，是對全球經濟失衡原因的理論性反思。對這一輪金融和經濟危機有諸多理論性解釋，較為廣泛被接受的是危機發端於美國經常賬戶失衡狀況的急劇惡化，其背後是東亞各經濟體在 1998 年危機後所採取的作為自保的出口導向策略和外匯儲備積累。這無疑過多將失衡的天平壓在發展中國家一端，林毅夫教授

對此的看法是，危機根源於美國金融監管放鬆帶來的高槓桿率和長期的低利率政策，由此引發二十一世紀前十年的流動資本劇增和房地產泡沫，並通過過度消費、財政赤字、美元國際儲備地位等機制形成大量資本外流，最終在美國房地產泡沫破滅後擴散為全球性金融和經濟危機。這一推斷揭示，這種美元儲備地位的重要性與其貨幣政策的相對獨立性之間的制衡缺失，推動了近十年來的全球繁榮，也同樣埋下危機的種子。過多地將全球失衡的原因歸結為中國近十年來的快速發展是有失偏頗的，中國在 2005 年以後才出現大量貿易順差，並且這種巨額經常賬戶盈餘也並非完全源自家庭儲蓄動機，而更多是雙軌制改革後遺症下勞動力大量富餘和大型國有企業的持續市場扭曲。因此，當前的經濟失衡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中都能找到病源，單方面解決並不是最好的方案。

其次，是對金融危機之後經濟失衡解決的理論思考。在這一次金融動盪之後，對凱恩斯主義的探討和批判十分激烈。2009 年以後全球性的逆周期寬鬆貨幣政策、主動財政擴張暫時拉動了全球經濟復蘇，但四年之後人們發現由此造成的槓桿率提升、低利率依賴、量化寬鬆模式效果遞減、貿易保護再次興起等負面壓力更為顯著。人們開始認識到，凱恩斯主義在單一國家可能通過貨幣貶值、提升外部需求走出危機，但如果危機在發達國家同時發生，這種以鄰為壑的做法就顯得缺乏實際效果。林毅夫教授提出了一種「超越凱恩斯主義」模式，即進行全球協同的、反周期的、消除增長瓶頸的基礎設施投資。他指出：一方面，全球性財政政策應該具有主動性和反周期的特點，重點放在能促進當前就業和提高未來生產率的項目上，特別是基礎設施、綠色產業和教育等項目；另一方面，仍有巨大空間的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促進生產率推進基礎設施投資，而國內機會有限的發達國家則應該創造條件支持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從而實現共贏。可以看到，新的「馬歇爾計劃」並非不可行，關鍵是要跳出一國一城的局限，應當推動發達國家幫助發展中國家進行結構性改革，持續進行基礎設施投資，這樣也能通過對

發展中國家的出口提高發達國家的需求。通過給多邊開發銀行（包括世界銀行和區域性開發銀行）提供同等資金，能夠起到連接不同經濟體實際需求的作用，從短期和長期來看，林毅夫教授站在他的立場上給出一個共贏的策略。

最後，是對國際貨幣新體系的探索。當前的金融和經濟危機已經顯示了國際貨幣體系的脆弱性，而新興的多元儲備貨幣體系同樣具有內在不穩定性，因為這並不能保證所有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都能保持健康、強勁的經濟，從而導致各種貨幣就外匯儲備和國際貿易地位展開更激烈的競爭。值得關注和思考的是林毅夫教授在本書中提出的單一超國家儲備貨幣，即用名為「紙黃金」的全球儲備貨幣來替代目前的國家儲備貨幣體系。作為凱恩斯曾經提出名為「班柯」的國際貨幣的改進版，這種方案在當前美國經濟規模佔比下降、美元儲備貨幣不穩定性日益顯現的背景下，可能是一種多方能夠受益的模式。儘管可以預見的是，在操作上這種方案還需要經歷較長期的博弈、探索和嘗試，但正如七十多年前凱恩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過程中對羅斯福總統的答詞裏所說的：「既然我們要致力於一種共同標準、共同法則，它就應該是所有人樂於接受的。」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方向無疑也應當向更穩健、照顧更多經濟體利益以及避免國家利益與全球利益內在衝突的道路前進。

凱恩斯曾經調侃說，實際上經濟學並不是十分困難的學科，但是為什麼優秀的經濟學家鳳毛麟角呢？他認為關鍵是傑出的經濟學家必須具備多種學科以及從理論到實踐的「種種才能的良好結合」。讀者可以從林毅夫教授近期的一系列新著作，當然也包括《從西潮到東方》這本書中，看到這種結合所取得的成果。

巴曙松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
中國銀行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

中文版序

世界銀行是國際上最為重要的多邊發展機構之一，其首席經濟學家被認為是國際經濟學界的最高職位，歷來都由人們仰之彌高的歐美發達國家著名經濟學家擔任。我有幸成為第一位擔任此要職的發展中國家的學者，任期從 2008 年 6 月開始。接受此任命時，我原打算根據世界銀行的成立宗旨以及我的職位要求，將我二十多年來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改革和發展成功以及失敗經驗的心得奉獻於世界的減貧事業，然而意想不到的，剛上任三個月，就爆發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大蕭條」以來最為嚴重的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國際宏觀經濟和金融在分工上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業務範圍。這場危機突如其來，由發達國家引爆，迅即波及發展中國家，給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和減貧事業增添了諸多困難。為了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這場危機，避免發展中國家甚至發達國家再次發生同樣的危機，我必須對這場危機產生的原因進行分析，思考其經驗教訓，並對最終解決這場危機的辦法提出一些建議。奉獻給讀者的這本書是我這些努力的一個成果，書中所展現的視角可能會對人們通常接受的觀點形成挑戰。

作為一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知識份子，就像中國古典小說《西遊記》中去西天取經的唐僧那樣，我過去總相信西方發達國家擁有一部真經，只需學會，帶回國來應用，就可以幫助祖國實現現代化，走向繁榮昌盛，使中國重新屹立於世界發達國家之林。讓我感到幸運的是，在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之初，我就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機會，負笈現代經濟學的聖地——芝加哥大學，向包括幾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在內的大師們學習現代經濟學。

四年寒窗苦讀，順利拿到博士學位後，我又到耶魯大學經濟增長中心做了一年博士後研究，1987年謝絕了幾所大學和世界銀行的工作邀請，我滿懷信心回到改革開放事業正在如火如荼進行的祖國，準備奉獻所學到的前沿知識，出謀劃策，幫助政府解決改革發展中遇到的問題。但牛刀初試以後，卻讓我對在國外學到的那一套邏輯嚴謹、看似完美的現代經濟學理論體系在中國的運用產生了疑惑。

1988年，經過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首次遭遇到了兩位數水平的通貨膨脹。一般經濟學教科書和前沿的宏觀經濟學理論模型都要求政府提高利率，以抑制過熱的投資和消費需求來治理通脹。可是中國政府並沒有調整利率，而是進行所謂的治理整頓，以行政手段砍投資、砍項目，大量的在建項目成為半拉子工程。以當時的宏觀經濟學理論為準繩來評價，這樣的治理政策是不理性的。

自亞當·斯密以降，整個現代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基礎是理性人假設。經濟學教科書中所介紹的和前沿學刊上所發表的理論均以決策者的行為、選擇都合乎理性原則為隱含前提，也就是決策者在面臨選擇時總會從各種可選方案中選出其認為最好的、最能實現他所要達到的目標的方案。如果中國的通脹治理政策表明中國政府是非理性的，那麼現代經濟學的整個理論體系在中國就不適用。但如果中國政府的行為是非理性的，它的政策又怎麼能在1979年啟動改革開放以後獲得連續十年、年均10%的高速增長？很顯然中國政府是理性的，面對1988年的高通脹所採取的治理措施不同於教科書和前沿理論給出的答案，是因為中國政府面臨的約束不同於當時教科書和前沿理論中所假設的條件。

那次經驗讓我體悟到，要分析中國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問題，提出解決的辦法，不能簡單照搬教科書和學刊中的現成理論，必須深入中國經濟的現實，根據中國實際的條件約束，按照理性原則自己進行分析，自己建立理論模型，才能發現問題的本質，提出對症下藥、藥到病除的方案。

我在芝加哥大學的導師西奧多·舒爾茨（Theodore W. Schultz）也曾有類似的經驗。在他開始進行農業經濟學的研究時，人們普遍認為傳統農業社會裏的農民是非理性的，因為他們不會像現代工業社會的「理性」農民那樣進行儲蓄和投資，春耕、夏種、秋收、冬藏，一年忙下來以後，除了留些種子外，他們生產多少就消費多少。但舒爾茨教授經過對落後國家農民的仔細觀察和研究後發現，這些傳統農業社會裏的農民不進行儲蓄和投資其實是理性的，因為在缺乏技術進步的情況下，儲蓄和投資的邊際報酬接近於 0，對生活於生存線邊沿的傳統社會的農民來說，省吃儉用，進行投資不能多產多得，反而使自己進一步缺衣少食，是不理性的行為。在舒爾茨發表於 1964 年的經典名著《改造傳統農業》一書中，他提出改造傳統農業社會的關鍵不在於改造農民，而在於源源不斷地給落後國家的農民提供合適的、較好的、能使他們增產增收的新技術。他的這一洞見給農業經濟學的研究和農業政策帶來了革命性影響。

對於一位像我這樣以研究理論和政策問題為職志的年輕經濟學者來說，既然中國政府是理性的，那麼為何對 1988 年的通貨膨脹不願意採取一般理論所主張的提高利率的政策來治理？在思考這個問題時，又讓我聯想到為何中國已經進行了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開放，還要繼續給不少企業各種保護和補貼？往上追溯，為何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政府要採用會降低資源配置效率的各種市場扭曲？

對這一系列問題的深入考察和思索，讓我豁然發現，這是因為許多大型國有企業的生存依賴於低利率貸款和其他人為扭曲所提供的隱性補貼。這些大型國有企業大多數是中國政府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推行「十年超英、十五年趕美」的趕超戰略下的產物，具有資本密集的特點，技術比較先進。但是在五十年代即使到八十年代，中國還是個貧窮落後以農業為主的國家，這些企業所在的產業不符合中國勞動力多、勞動力成本低、勞動密集型產業具有比較優勢的國情，它們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缺乏自生能力。如果 1988 年中國政府按照現代宏觀經濟學理



論提高利率來治理通脹，或者 1979 年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政府根據「華盛頓共識」採取休克療法立即消除各種保護、扭曲，將會導致大量的國有企業破產，造成像後來出現於東歐和蘇聯轉型時那樣的大規模失業以及社會和政治動盪。這樣的結果顯然不利於中國的人民和中國的發展。

當時國內外經濟學術界有不少人根據那時的理論認識，持「計劃經濟不如市場經濟，雙軌經濟是最糟的經濟」的觀點。但是，中國政府卻推行雙軌制的轉型策略，一方面繼續給予傳統重工業部門的低效企業必要的保護補貼，另一方面放開符合中國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進入，而同時取得了經濟的穩定和快速增長。此點認識，蔡昉、李周和我在 1994 年出版的《中國的奇跡》一書中進行了論述，後來我在 2008 年出版的《中國經濟專題》中也再次進行了闡述。^①

對於中國政府治理 1988 年通貨膨脹政策的思考，啟發了我採取一種老子所主張的「如嬰兒之未孩」的「常無」心態來觀察世界上的各種事物。在考察問題、提出政策建議時，我不再直接根據現成的理論或者過去的經驗，而是每次都嘗試直接尋找經濟現象背後的行為人，分析他們所要達到的目標、面臨的約束及可能的選擇，每次都自己從頭開始構造一個能夠說明問題的來龍去脈的因果關係模型，就像我新近出版的《本體與常無：關於經濟學方法的對話》一書中所倡導的那樣。^②

隨着中國經濟的奇跡式增長和國際影響力的提升，我跟着水漲船高，獲選為首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我的職責包括擔任世界銀行行長的首席經濟顧問，領導世界銀行在發展經濟學方面的研究工作，以及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健康、快速、可持續、包容性的增長，使全世界擺脫貧困。儘管在二十一世紀的最初十年，全球經濟湧現出了包括若干新興市場經濟體在內的多個增長極，但是非洲和其他地區的許多國家依然在低收入陷阱中掙扎，未能縮小與發達經濟體的收入差距。在本輪危機未爆發前，我認為自己在世界銀

行的工作上面對的主要挑戰在於能否提出一個可行、有效、新的發展理論和政策框架，幫助那些貧困國家改善發展績效。

任職後的第一週，我就訪問了南非、盧旺達和埃塞俄比亞，然而致力於促進貧困國家發展經濟的原有計劃很快就被雷曼兄弟的破產以及接踵而至的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所打亂。宏觀經濟學是現代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是現有的理論和諸多大師級的宏觀經濟學家既未能預見這場危機的到來，危機到來以後也未能對危機的程度和持久度做出準確的判斷，提出解決問題幫助世界擺脫危機的可行辦法。在國內工作時所養成的「常無」心態，對我理解這場危機的本質、來龍去脈和出路大有幫助。

當我在 2008 年 6 月抵達華盛頓的時候，糧食和能源價格的飛漲佔據了所有媒體的顯著位置，是各界關注的焦點。我向自己的同事提出：在通貨膨脹得到遏制後，接下來是否會發生通貨緊縮？大多數經濟學家對這個問題不以為然，因為他們相信「大緩和」的經驗和說法，其含義是，在本輪危機爆發前二十年的經驗證明，歐美發達國家的政府都已經能夠嫺熟地運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成功地緩和了經濟的周期波動，認為會發生通貨緊縮是無稽之談。

2008 年 9 月雷曼兄弟破產，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治理通貨緊縮成為各國政府面臨的挑戰。雖然危機來勢洶洶，但是多數經濟學家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發生在發達國家的經濟危機，短者三個季度，長者七個季度，危機就會過去，經濟就復蘇，這次危機也不會例外。根據過去的經驗和理論，多數經濟學家主張政府只要加強社會保障體系，給窮人和弱勢群體提供必要的支持，並依靠在危機中財政收入減少、社會開支增加所形成的財政赤字的「自動穩定機制」的作用就可以度過危機。我則懷疑：由於全球經濟在危機前經歷了不尋常的投資拉動的長期繁榮，形成了許多生產能力，危機爆發後各國失業率高，消費需求受到抑制，產能也必然過剩，尤其在發達國家投資很難找到新的機會，民間的投資意願會很



低，沒有啟動需求的外在刺激，經濟很容易陷入需求不足、產能過剩、增長緩慢、失業率居高不下的通貨緊縮惡性循環怪圈。

過去的危機一般只發生於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政府可以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讓貨幣貶值增加出口，靠外部需求的拉動走出危機。這次危機則在發達國家同時發生，問題從量變引起質變，各個發達國家失業率高、產能過剩的問題不能靠以鄰為壑的貨幣貶值政策解決，如果沒有新的政策思路和對策，這場危機將會曠日持久，難以擺脫。

危機之初，我提議進行全球協同的、反周期的、消除增長瓶頸的基礎設施投資，並將其命名為「超越凱恩斯主義」(Beyond Keynesianism)，以啟動全球需求，消化全球過剩產能，恢復全球經濟的穩定和增長。當時多數經濟學家對各國政府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持保留態度，認為政府財政赤字的增加會增加民間未來稅負的預期，減少民間當前的消費意願，陷入政府債務迅速高築而總需求增加有限的「李嘉圖等價」的困境，對全球協同的反周期政策更是不以為然。

通過 20 國集團採取的協同刺激措施，世界經濟在 2010 年上半年出現了復蘇的苗頭。據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 2010 年秋季年會時提出建議，要求那些受危機困擾的國家緊縮財政、減少赤字，以恢復民間投資和消費的信心。我當時指出，這樣的政策可能導致經濟增長放緩、失業率增加，財政赤字反而激增，給經濟復蘇蒙上一層新的陰影，進一步降低民間投資的意願。這一擔心不幸再次被證實。我當時提出財政政策的重點不在於如何減少短期赤字，而在於提高政府財政支出的質量，使其在短期能夠創造需求、增加就業，在中長期提高生產率、經濟的增長率和財政收入，實現中長期的財政平衡。這個觀點在 2011 年秋季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倡導的主要政策方向。

如今，全球都在關注歐元區國家的債務危機。而我擔心的是，如果不採納我在危機爆發之初就提議的「超越凱恩斯主義」的全球復蘇計劃，化危為機，給

發生危機的高收入國家提供結構改革的空間，世界經濟可能走向更為漫長的衰退「新常態」，甚至陷入多個「失去的十年」。我也高興地看到我這一主張在全球輿論和政策界獲得了愈來愈多人的贊同。

本書將闡述我對全球經濟危機根源的分析，指出可以引領全球走向穩定和可持續發展的共贏策略和實現該策略預期的可能性，並提出避免同樣的危機再次發生的國際經濟新架構。

自十五世紀的地理大發現，尤其是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以後，少數西方發達國家雄踞全球的霸主地位，經濟上、政治上和理論思維上殖民於全世界。為了追求國家的現代化，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知識份子到發達國家學習先進的理論，但是根據西方主流理論制定發展或轉型政策的國家無一成功，發展或轉型成功的國家的政策以當時的主流理論來看卻經常是離經叛道的。^③

理論不管是社會科學的還是自然科學的，都只是一套簡單的、說明現象的因果關係的邏輯。發達國家的學者提出的理論通常根據發達國家的社會現實，說明出現於發達國家的現象，或是以發達國家的經驗為參照來看發展中國家的問題。那樣的理論不能說沒有價值，但是，發達國家發展出來的理論並非一成不變，舊理論經常被新理論否定，新理論又被更新的理論否定，例如，宏觀經濟學中，凱恩斯主義被理性預期學派所否定，理性預期又被後來的新古典綜合派及新凱恩斯理論所否定，發展中國家到底應該學習哪派理論？而且，發展中國家的條件經常不同於發達國家，簡單照搬容易產生「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甚至是「好心幹壞事」的結果。發展中國家的學者應該解放思想，包括自己傳統的和西方的思想，實事求是地根據自己國家的現實，分析問題，了解背後的因果關係，自己獨立構建理論，這樣提出的理論可能和傳統的或西方的現有理論相同，也可能是全新的，只有每次都經過這樣的創造性重構的努力，才能發現問題的本質，提出與時俱進的、能推動國家現代化、走向繁榮和長治久安的政策措施，也只有這樣的



方法才是科學的而不是教條的方法。

在全球經濟日趨一體化的多極增長新格局中，發展中國家的學者不僅應該對本國的問題自己進行理論分析，而且應該根據自己的認識對發生於全球的甚至發達國家的問題提出自己的理論見解和政策建議，這是發展中國家的學者面臨的機遇、挑戰和需要承擔的責任。本書的出版希望能夠對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學者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本書的原稿以英文寫成，英文版將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在研究和寫作過程中，我在世界銀行的同事 Vandana Chandra、Jean-Jacques Dethier、Doerte Doemeland、Shahrokh Fardoust、Vivian Hon、Celestin Monga、Bruce Ross-Larson、David Rosenblatt、Volker Treichel、James Trevino 和王燕等人提供了許多協助；這本中文版則由余江翻譯，對上述諸人的幫助在此一併致謝！最後也感謝我的妻子陳雲英對我在世界銀行工作四年全心全意的支持。

林毅夫

注釋

- ① 《中國的奇跡》英文版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於 1996 年出版，後來還被譯成日、韓、法、俄、越等國文字出版。《中國經濟專題》德文版於 2010 年出版，英文版則以《解讀中國經濟》(*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Economy*) 為名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於 2012 年出版，日文、韓文、越文和俄文等文字版本也即將面世。
- ② 此書根據我在北京大學上課時和學生的對話整理而成，中文版由北京大學出版社於 2005 年以「論經濟學方法：與林老師對話」為題出版，英文版則以「本體與常無：關於經濟

學方法的對話」(*Benti and Changwu: Dialogues on Methodology in Economics*) 為名由聖智學習出版公司於 2012 年出版。

- ③ 詳見我 2007 年的馬歇爾講座和新近出版的新結構經濟學。前者中文版由北京大學出版社於 2008 年以「經濟發展與轉型：思潮、戰略與自生能力」為題出版，英文版以同名在 2009 年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後者有兩本書：英文版《新結構經濟學：一個反思發展理論和政策的框架》由世界銀行於 2012 年年初出版，《繁榮的求索：發展中經濟如何起飛》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於 2012 年 9 月出版，兩本書的中文版都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在 2012 年秋出版。